



《李清照诗词选》陈祖美撰/商务印书馆2015年2月版/18.00元

一代词宗夏承焘说“易安心事岳王知”，乃是指李清照与爱国名将岳飞有着共同的江山社稷之虑。该书作者在历代学术成果基础上，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从而演绎出李易安的诸种“心事”——在作者四十年间有关李清照的十余种撰著中，陆续考证出其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十余桩“心事”，提出了多种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应该说，此书系作者近半个世纪研究李清照的“集成”之作，而不仅仅是个选注本。

本版关注



“面对死亡的人”丛书[法]菲利普·阿里耶斯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2月版

《面对死亡的人(上卷): 卧像的时代》吴泓缈、冯悦译/35.00元;《面对死亡的人(下卷): 野蛮化的死亡》王振亚译/38.00元

该书展现了西方从中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历史。阿里耶斯的著作奠定了一套对死亡观的话语解释系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阐释、修正和取舍的基础。该书的上卷研究了历史上面对死亡态度的演化、教堂中的圣墓、末世观念与末日审判、葬礼的变迁以及墓地的雕像。下卷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死亡观念的变化，对死亡的冷漠态度、浪漫主义态度，以及现代西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被倒置的死亡的现象等。



马礼荣: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运动新一代的领袖人物,巴黎四大和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还原与给予》、《没有存在的上帝》、《白色神学》等。

限制性彻底暴露出来,使得自我的优先性成为一个在爱中应该克服的东西,而自我中心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的惯常态度,也是笛卡尔所开创新的主体性哲学的隐含逻辑。所以尽管“有人爱我吗?”问题把我们带到了爱洛斯还原的开端,但是为了不止步于恨而深入到一个环节,我们必须不去计较自我的所得,而提出“我,自我,我可以第一个去爱吗?”的问题。我首先去爱,首先去付出,这看似是一种失去,实际上我却在这种失去中赢得了抵御徒然的保证。爱洛斯还原在这里得以根本化,我因此成为爱者(爱洛斯者)。我因此处于我的独一无二性之中,我真正成为我自己,被我爱的人也成了独一无二的人。我的前进使得我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他人中心,所以,尽管我的保证是由我的前进引起的,但是它并不来源于我自己,而是来源于我所爱的他人。

去爱意味着前进,意味着中心的偏移,意味着无保留地付出和冒险。我承受着受到伤害的风险却心甘情愿停留于没有武装的状态之中,因而处于一种受让性之中,由此我成为了“肉”(la chair)。“肉”在这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去中心化了的主体性,它并不是躯体、肉体,却使得躯体、肉体的功能得以可能。对于马礼荣来说肉是最根本的,肉就是我,我就是肉,我成为了肉,我才真正成为我自己。然而,我自己不能向我自己给出肉,我只有触及另一种肉才能自己成为肉。另一种肉,他人的肉,通过在我前进时不阻挡我不抵制我而是接受我甚至让位于我,而向我本身揭示出我的肉。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人给出他的肉。我们由于互相接受,互相依赖,而互相成就各自的自己。在这个爱洛斯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享乐,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但由于爱洛斯化本身固有的有限性,我们的享乐在达至一个高点时只能中断,爱洛斯化也中断。这种中断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暂时的,后者意味着爱洛斯化重复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中断之后和发生之前的这个间歇,是一个暗黑的阶段。

自由的爱洛斯化

爱洛斯化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肉与肉之间的作用就像龙卷风一样强力、自发、不受自我的控制。这首先导致了猜疑:爱洛斯化究竟有没有发生过? 他人的个人人身(personne)究竟有没有参与进来? 他是不是给我誓言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他? 然而在爱洛斯化中他不可能是他的个人人身,我也一样,我们都是自动地进行爱洛斯化的肉。所以“我爱你”和“我在这里!”有可能只是谎言,有可能是勾引或花言巧语。那么我是否能通过在这种自动的爱洛斯化当中求得我的个人人身和他人的个人人身来避免谎言的可能性? 马礼荣的结论是不行的,这种努力会导致“劫持”和“倒错”。那么什么才使得他人的个人人身得以现象化呢? 那便是嫉妒,甚至是对他人的恨。嫉妒并非要求他人对自己忠诚,而是要求他人对他作为爱洛斯者的身份始终保持忠诚。在这里,他人的个人人身以一种缺席的方式成为现象,我并不是完全不能触及它,我只能通过触及它对于我而言的缺乏来触及它。

如果爱洛斯化的肉和他人的个人人身不可兼得,爱对我来说便成了两难。幸好,还有另一种方式来使用肉,同时他人的个人人身又不至于被遮蔽。这种方式就是一种自由的爱洛斯化。自由的爱洛斯化不需要身体上的接触,而单单通过言说就能向对方给出肉。这种言说并不在于谈论什么主题和对象,而是在于两个人互相说话,互相激发对方的爱的状态。通过爱洛斯的言说,即便两个人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但也向对方给出对方的肉,并且双方都是作为个人人身参与其中。自由的爱洛斯化因此极大地拓展了爱的范围,家庭的爱、朋友的爱、人类对上帝的爱,都可归于其中。

爱要求永恒的忠诚,马礼荣认为这种要求是内在于爱的。这意味着爱洛斯化的过程要么需要一次又一次历尽风雨地重复,要么有一个我们两人之外的第三者作我们誓言持续的见证,使我们共同的爱洛斯现象用一种稳定可见的方式显现出来。这种第三者,这种第三现象,就是孩子。然而,一个孩子不能永远地作见证,他总是在得到他自己的肉之时就离开。因而我们只能不断被驱使着去重复整个过程——可以说,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地狱”(第394页)。为了求得解脱,我只能在爱中持一种未世论的态度:“犹如你的下一个爱的行为实现你的爱的最后可能性那样现在去爱。”这种态度最终使我们通向上帝,上帝被我们当成是最后的见证人。

从此,我具有了爱洛斯者的尊严,我因此也成了一个配得上别人爱的可爱者。这一点使我最终发觉,原来他者早就已经在爱之中前进,早就在爱着我,换言之,在我前进之前,爱洛斯还原已经由他者所启动,“我最后明白我曾经寻找的东西原先已经发现我且原先已经引导我直接走向它”(第407页)。

爱洛斯者如何个别化

我们可以看到,马礼荣建立了一个以超越相互性和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为特征的“爱的范式”,并把所有种类的爱都囊括到这个范式之中,以此建立起爱的概念的统一性和单一性。整个爱洛斯还原的过程的动力机制显示出一种别样的理性和逻辑,一些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晦暗的甚至疯狂的要素,在这里被展示为具有自己合情合理功能的动力环节。可以说,马礼荣出色地实现了三条纲领的前两条。然而,对于最后一条纲领即我根本是爱者的论述,却并不令人满意。马礼荣在这里用一种普遍性所不能及的个别性来标志一种根本的“属我性”。在该书第22节当中马礼荣专门论述了爱洛斯者如何个别化的问题,他提出爱洛斯者通过欲望、永恒性和三重受让性来个别化。这三个特征无疑使我们更加清楚爱洛斯者的特征,但是它们仍然显得是形式化的因而有如隔靴搔痒。在37节中,马礼荣对这个问题有所补充,他提出我的爱洛斯的体验是最属于我最内在于我,我因此而个别化。但此说亦不能很好地说明在个别性方面爱洛斯者如何优于例如胡塞尔的“单子”式自我或者海德格尔的“向来我属”的此在,毕竟我的所有意识行为和生存论活动即便不是爱洛斯的,也不是别人可以替代我来实现的。这种状况使得现今法国年轻一代的现象学家罗马诺(Claude Romano)对于爱洛斯还原的质疑变得有其合理性;与其说爱洛斯还原是一种普遍的针对所有现象的还原,不如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现象的本质还原。

实际上,《情爱现象学》是一部奇妙的汇聚点式的著作。从马礼荣自身的思想发展来看,这部著作把他三个方面的探索——用帕斯卡启发的爱的理论来超越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性,用爱的神学来超越理性神学,用一种被动的接受的主体性来超越胡塞尔的超越论主体以及海德格尔的此在——都推向了其目标并把它们在顶峰处融合起来。所以,《情爱现象学》对于哲学爱好者以及想要探索爱的奥秘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佳作。此书原文系法文,充斥着各种文字游戏,不好读,更不好译。中译本译者的翻译准确度较高,同时做了八万余字的注释,细心指出字里行间的重重机关,就国内当今法国哲学的翻译现状来说亦属难得。至于爱是否如马礼荣所言是一种最初的现象,则需要读者自行去探索和印证。

《诗经词典》的编纂有首创之功,领风气之先,开创了专书辞典编纂的先河,创立了专书辞典的收词、注音、释义和书证等方面的基本范式,为专书辞典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诗经词典》修订本是专书辞典的里程碑。

一部音义兼备的专书词典

编辑后记
○乔永(书评人)

向熹先生是古汉语研究领域令人敬重的一位学者。能把他的《诗经词典》介绍到商务印书馆,要感谢叶军博士。2006年时,叶军正在责编向先生的《简明汉语史》,一天她问我了解《诗经词典》吗?她说向先生愿意把《诗经词典》修订本转嫁到商务印书馆修订出版,希望我跟随向先生联系。《诗经词典》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很难见到。我立即跟向先生联系,并在馆里报了选题。2010年夏天,在北大王力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我和叶军又拜访了向熹先生,进一步谈了编辑加工的有关细节,又谈了《诗经译注》等书稿的出版事宜。

向先生既有深厚的古代文化修养,又有化繁难为平易的现代汉语水平,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在当今学界并不多见,向熹先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作为编辑室主任复审的第一部辞书稿。2010年,向先生交来的《诗经词典》修订剪贴稿厚厚的四大本,当时我被安排负责古代汉语编辑室工作,工作重心已转向《辞源》第三版修订,为了不影响《诗经词典》进度,培养年轻编辑,我分配何瑛、徐从权、黄御虎和我自己一人一本,认真编辑加工。复审时我认真看了每一页稿件。后来的几年里校对出版等,徐从权做了很多工作。

二

创立了专书辞典的编纂模式。《诗经词典》是我国第一部音义兼备的专书辞典(新版《诗经词典》序)。《诗经词典》的编纂模式在辞书界特别是专书辞典编纂领域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开启了专书辞典编纂的先河,为后来《二十五史专书辞典》、《十三经专书辞典》等的编纂打下了编纂理论和实践基础。

《诗经》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创作的源头,对于研究汉民族语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甚至它的动物植物等名称,都是农业百科研究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材料。一本书收录所有单字和复词,注音、释义,并加书证,相当于帮助您读了一遍《诗经》。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里。对它的解释理解,在国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阅读、解释经典变得格外重要。

向先生《诗经词典》收《诗经》中约2826个单字及近1000个复音词,还有305篇题解和有关诗经研究的术语300余条,总计1318条。提供了《诗经》词汇的全貌,有利于汉语词汇研究,是专书词典编写的主要方向。向先生的《诗经词典》释义采取首出己见,择要兼收的方式,比较切合实用。《诗经》305篇,含单字2830个和500多个异文,复音词(含篇名)1311个。《诗经词典》的字头以现行通用字作为字头,有对应的繁体字、异体字,则在字头后用()表示。如:爱(爰);为(爲)。字头只出现在词条的上字或下字,均用[]表示。前者接着释义,后者作互见条处理。修订本增加材料上千条,

向先生做学问以严谨细致的态度著称,编辑《诗经词典》更是倾注了心血,王力先生在序中说“作者博采群书,用力甚勤”,此言不虚。向先生《诗经词典》对《诗经》中的字、词均做了详细的注释,对诗体也做了详尽介绍。1986年出版后,又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修订、补充它,使它日臻完善,泽被后世,功德无量。编纂中他提出的释义要“首出己见,择要兼收”,对后来的专科辞书编纂有指导价值,这种方法也为我们读者阅读和研究《诗经》提供了便利。

三

首创“首出己见,择要兼收”的释义范式。专书辞典既有一般词典的特点,又有专书词典的特殊性。怎么处理好收词、注音和释义,是每一位编纂者都要面对的问题。《诗经》作为传统文化源头和国学经典,经过汉、唐、明清历代学者的注、疏等,训诂释义方面的材料,汗牛充栋。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认识、见解不同,见仁见智。专书词典释义中怎样既有自己的创见,又能让读者领略历史长河中有关的字、词的其他理解,向先生找到了“首出己见”的释义范式。

《诗经词典》“首出己见”又广列义项,让读者有比较选择,可以满足不同需要。释义中的“首出己见”,就是把自己认为字、词的最正确的解释首先列出来。凡是学术界公认的已有定论的解释,列在前面。有些尚无定论的,以作者认为正确的解释,排列在前面,后面兼述他说。不妄下结论,给读者提供较为可靠的字、词义和继续研究的空间。

正像《辞源》修订本注音中把最契合的中古来源反切放在最前面,其他的排在其后一样。择要兼收,是有选择地收入不同的见解。汇集了历代各家有代表性的解释。可以说,一册《诗经词典》在手,历朝历代《诗经》研究,特别是文字词汇训诂研究成果尽在囊中。这是《诗经词典》的特色。

书后有“重要引书目”,从《诗序》、《毛诗古训》、《毛诗郑笺》到《诗经今注》、《诗经释》,汉、唐、宋、明清,一直到现代,历朝历代对《诗经》的词义解读与注解汗牛充栋,往往让研读者无所适从,作者几乎看了所有有关文献。

四

《诗经词典》开创了专书辞典收词排序的范式。对字头、注音等内容的处理有很强的专书特点。对字头的处理,字头简化前是几个不同的字,则分别几个字头,并在字头右上角用1、2、3等表示。如:干1,干2(乾);获1(獲);获2(穫)。字头释义后列举词条,用[]表示。如:颠(顛)dian 头顶。颠倒。[颠倒]倒置。跌倒。

而注音既继承了《辞源》注音的特点,又有所发展。注音兼注汉语拼音、反切、中古音(撮、呼、等、调、韵、声)和上古音(声、韵)。反切主要依据《广韵》,《广韵》未收的依《集韵》,《集韵》也未收的,用其他书中的反切,并标出书名,这与《辞源》注音模式基本一致。《诗经》可以代表上古音,所以都标注了韵部和声母。

《诗经词典》附录列举了众多的文献,告诉了我们有哪些文献,该读哪些经典。从历代解释《诗经》历史文献中归纳出词义,是创造性的劳动,是“例不十,法不立”思想的延伸,我们编纂古汉语词典都可遵从。

哲学译丛
○余君芷(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

以哲学的本义为爱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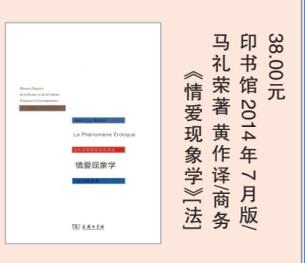
爱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令人惊异的是,哲学对爱说之甚少。长久以来,以理性为根基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一直占据着哲学舞台的中央,对于爱的讨论往往经历着双重的边缘化。商务印书馆“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2014年新出的《情爱现象学》一书的作者、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马礼荣则试图从“哲学”(philosophia)的本来之义即“对智慧的爱”出发为爱正名:“哲学在打算去知之前应该从去爱开始”(第3页),“在所有情况之中,人们要想达到真理,应该首先去欲求真理,因此去爱真理”(第4页),等等,都说明如果原初地从“知”出发,从理性、逻辑、科学、存在、认识出发来探讨一切,根本上会与哲学的最初规定背道而驰,也会与爱的初衷相悖。

马礼荣在该书中首先为哲学“正本清源”,把哲学一直以来所拒绝的爱的概念的统一性、合理性和至上性全都恢复了回来:首先,爱具有一种独一无二性,因此爱的概念应该是统一的,把各种不同的爱理直气壮地区分甚至对立起来,是对爱的概念的损害;第二,爱本身具有着一种特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能被计算和度量的理性所贬低和取消,而是属于一种“更伟大的理性”;第三,这种理性之所以更为伟大,是因为它在更加根本的意义上规定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上首先是“爱者”(爱洛斯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激动人心的计划。而实现这个计划所依靠的,是现象学的方法,即“回到事情本身”,不把任何理论假设当作前提,而单从爱(爱洛斯)的现象出发,来构造每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如何回到爱洛斯现象呢?通过一种马礼荣称之为“爱洛斯还原”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还原在胡塞尔提出来的时候本应是一种观念操作,它悬置(即不判断)意识对象的实存以便只讨论意识对象的显现,它也悬置一切前在的偏见、预先判断、传统成见,还意识对象最初显现的面貌。随着现象学的发展,现象学还原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不同的现象学家对于什么东西可以还原、应该如何还原、还原的剩余物应该是什么有着不同的见解,但相同的是,现象学还原始终是通过使现象的非本源的层面不起作用而使其本源的层面变得可以通达。“爱洛斯还原”也一样,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最原初、最根本的一种状态的操作。这种还原并不像胡塞尔的还原那样仅仅是一种“目光的转换”,相反,马礼荣通过“反向意向性”等等技术性操作把“爱洛斯还原”描述成一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千回百转的过程,这么一种华丽的还原是现象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独一无二的爱与被爱

正如笛卡尔为了寻找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出发点而陷入普遍的怀疑一样,一个“有什么用?”的问题使我们陷入一片普遍的茫然之中,这种茫然比普遍怀疑更加具有毁灭性和威胁性,因为用来对抗普遍怀疑的“我思故我在”在面对茫然时也变得软弱无力。为了抵御茫然,我必须有一种更加根本的保证,而要获得这种保证我就要去寻求“有人爱我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爱能够使我们免除茫然的威胁。“有人爱我吗?”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回应:要么是我自己爱自己,要么是别人来爱我。然而,奇怪的而且让人失望的是,这两种回应都会导致仇恨:要求我自己来爱自己会导致我对自己的恨,而要求他人来爱自己则会导致我对他人的恨和他人对我的恨——这是马礼荣在六个沉思的第二个沉思当中通过一段精彩绝伦的描述而得出来的结论。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提问的出发点:我总是想让自己首先得到爱。这个出发点虽然是有问题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环节使得自我中心主义在爱当中的局



38.00元
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版
马礼荣著 黄作译 商务印书馆